

好多人喊我吴老师，我都必须答应，毫不含糊。吴老师就吴老师吧，这是我的职业。就像面对动物园里的老虎，我们喊它老虎；就像面对大街上值勤的交警，我们也只喊交警，一样的。

我一直在某地当老师，没改过行，也没换过单位。或是我的忠诚，也可能是我的消极与无能。虽然我就业的学校多次更换名称，四次吧，一些人老是误读我的履历表，以为我工作不安心，频繁挪地方。但我始终还是吴老师。我也并不总是教授语文课，其间还执教过《财经应用文》《教育学》《公共关系学》甚至《商业会计》。但我始终还是吴老师。

当有人喊吴老师，我心底亮晃晃的，知道这些人并不都是我的学生。不过，如果不喊我吴老师，难道有更合适的称呼吗？应该没有的。有段时间我老婆也喜欢喊我吴老师，她背地里与人闲谈也是我家吴老师长吴老师短的，我觉得不受听。与她交涉，居然愤怒，反问我，你难道不是吴老师吗，又没当上校长，还想体面？后来，她故意气我，不喊吴老师了，直接对我“嘿”。比如说，“嘿，别一下课就发呆，赶紧把桌子收拾一下。”

人嘛，在社会上总得有个职业谋生，称呼某个人的职业也算是基本尊重，只不过老师不比校长尊贵，也不及教授虚荣。但在中学

师之惑

这是一个为数据疯狂的时代，各行各业，无数无尽的人们，在数字中奔波辗转，或安然自得，或流离失所。

教育，自然难以置身事外。考考考，似乎客观的法宝；分分分，好像学生的命根。大家都知道这是问题，但大家都在拼命追逐这个问题，使得此问题大得似乎不成为问题。有实在觉得这是个铁屋子，想呐喊几声的，砖头砸向的首先是老师，仿佛老师是全部问题的始作俑者。老师，自然难辞其咎，但老师自身，也会是问题的受害者吗？

我念书时光不长，不过12年。而12年求学生涯中，有几件小事深深影响着我后来的教师生涯。初中时，我的第一位班主任是曹鹏飞先生。第一次见面，他就问我：“你作文写得好，喜欢读书吧？”我点点头，心里奇怪着：才见面，老师是怎么知道这些的呢？也不敢问。他说：“那好，跟我去办公室拿几本书读读。”曹老师给我什么书，我早忘记了，但被老师珍重地懂得，念念不忘！

春日迟迟。有一天，曹老师不知从哪儿采来一株绚烂桃花，叫住我，笑着将桃花举在脸颊旁，考问我：“瞧瞧，想起哪一句诗？”我顿住了，他提了一个词：“去年……”“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。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”曹老师并非语文老师，他是

喊你一声吴老师

吴忌

里，扎堆的都是老师，扎堆地做着力气活，没日没夜，哪有尊贵和虚荣。严格地说，我似乎没几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学生。我的理想，师与生最好要有灵魂的交互。按照韩愈的标准，“师者，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”。执业如此，我好像还没有抵达“传道”的高度，心下惭愧。有次被人请去做专家，我的讲座标题就是《愧为人师》，语出肺腑，日月可鉴。

我当老师，起初并不由我，这好像是我父亲的理想。这个老农少年时候跟随他的师塾先生读过不少典籍，后来颇多“异见”。比如，他总是担心我的未来，尤其惧怕我把持不住自己犯错或者犯罪，就看准了教师行当，说，还是做老师好，自己读书为乐，职业课徒为生，到小镇上娶个白白胖胖的女裁缝为妻，小日子，不错。父亲常说世事难料，别让他老了还受惊吓。

1978年我初中毕业，父亲就急不可耐地替我填报了师范学校。我也喜欢，听说进了师范，国家就发生活费。但这事被我一帮叔父以“恭贺”的形式给毁了，他们围坐在稻场上乘凉的时候喜欢一起展望我的未来，说等三年之后我中师毕

业可以回油榨岭小学当老师，上班只在上午，下午可以回家帮着养猪。我父亲立即牢骚，次日立即改了志愿，让我去宿松中学首届重点班读高中。两年之后，我终于去了安徽师范大学。这次体面一些，我毕业之后成了宿松师范的老师，终于上午上课，下午上课，晚上也上课，日日夜夜都上课。为此，我父亲非常开心。我父亲说，当老师好，一生都在教室里，风不吹，雨不落，即便天灾人祸，国家的教育都会存在，不怕失业的。既然为人师表，哪能违心违法。不比做医生，万一发错了药打错了针也会出人命的；也不比做会计或者出纳，万一见钱眼开那是要吃牢饭的。满腹心事的父亲惟愿我一生平安，也就不计较我的庸庸碌碌了。

但是，当老师也不容易。面对一群激情澎湃的少年，日夜都有得轻松。有些学生就是难对付。这我有体会，因为自己当年就是这样的学生，我高中从理科重点班转读文科的时候，跟一帮自命不凡的优等生“闹过事情”，学校为此撤换了政治课老师语文老师撤换了班主任。我后来写过散文《火红的烙铁》。是的，我一直怀揣这块“火红的烙铁”，谨记从业的底线，无

论如何不能被自己的学生赶下讲台。为了自证，我将自己弄成了安徽省教坛新星、特级教师、正高级教师。虽然坏了颈椎腰椎落光了满头秀发，何敢马虎懒惰。

只可惜在中学当教师，是一件繁重的体力活。当你老来，许多事情就干不动了。倒不是不能站讲台上上课，而是根本就没有足够的体力批阅无穷无尽的作业，尤其没有眼力阅读密密麻麻的文字，更没有眼力熬夜评改试卷。当自己青春不再，面对青春的学生吃青春饭，资格就要被怀疑。看见年轻的同行风风火火进出教室，我心里难免有些落寞。可能，当了一辈子老师，心底的留恋，划痕很深。



吴忌，中学语文教师，安徽省教坛新星、特级教师、正高级教师，从教37年。

有裂缝，光才能照进来

汪琼

教数学和物理的。我想：在桃岭中学那样闭塞、偏远乡村中学教书，曹老师应该不懂什么情景教学，他只是单纯地喜欢着春天刚刚绽放的生命，巧妙地希望他的学生也能触摸这春的样子。

但我最喜欢的，却不是笑春风的桃花，而是漫山遍野的映山红。啃着上了霉的咸菜，就着半生不熟的米饭，上课使劲睁着睁不开眼睛的初三，曹老师居然想着带我们骑自行车去春游。春游的山名字大气磅礴——太阳山，据说李白漫游长江时曾经到过。那映山红开得那一个野啊，仿佛被死死束缚住的生命，终于挣脱着压制，喷涌而出，热烈得天地间只剩一片桃红。一群十几岁的少年，遍野漫山撒着野，闹得欢……那于我，几乎是纪念碑一样的春游，后来我才明白那是因为什么。

因为这些当学生时的生命记忆，等我师范毕业去当老师时，我自然没办法做一个困守教材、教室、考试的老师。我一直是个境感很差的人，一直不太在意别人在做什么，只是关注我自己想做什么、该做什么。我喜欢读书，自然带着孩子读书，那日日的清晨，我们班

教室传出去的朗朗读书声，并不都是语文书的内容。我觉得教室也在窗外，自然带着孩子们各种折腾，最远的一次，全班去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。我只是希望孩子们实地体验这段不能遗忘的历史，根本没想过万一有什么差池，后果会怎样。我想，当初曹老师带少年的我们出游，大概也没考虑很多吧？

但考试是一条铁律，谁都得过这道坎。一年级第一次期末年级统考，我们班——倒数。那些伺机而动的，终于找到机会起而攻之。有些家长之前有多信任，此时就有多怀疑。那时，我还年轻，很多事情看不清楚，也想不明白，因班级不堪的考试成绩被推至滔天巨浪中，我心理上何尝不随时面对船毁人亡的惨烈呢？而这样的经历，并非一次。因此，那一刻，不绕着我走，肯给我一个心疼的眼神、一句温暖鼓励的同事，一些依旧站在身边的家长，我至今感念！

时光，最终会给出一部分交代。我完整带了六年的那一届学生，后来大多长成好看的样子，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。当年成绩不好的孩子，多年以后大街上偶遇，依然欢天喜地跑过来抱住

我，或者依旧毕恭毕敬喊我一声“汪老师”，仿佛还是那6岁刚刚上小学的娃娃；考上北大的两位姑娘，或者和母亲一起跑杭州来看我，或者不时在微信里和我聊聊天。15岁从桃中毕业，早已遥远得没了返乡之路，但当年曹老师教我如何当老师，并没有因为走得太远而丢得一干二净。

我知道，在为分数生死挣扎更为残酷的今天，分享分数之外的故事非常虚无。可是，教育之途无非成长之路，分数无非不得已的一个衡量依据。那些能走得稍微远一点点的，自然是狂卷的分数之外，依然为人的幸福留有缝儿的老师、家长、孩子。因有裂缝，光，才有可能进入！



汪琼，小学教师，从教27年。